



CJEAS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

第 2 卷第 4 號 2018 年 4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台灣的文化政策與兩岸關係（2008-2017 年）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印

目次

■ 摘要.....	I
■ 論文	
前言.....	1
馬英九政權時期(2008-2016 年).....	2
蔡英文上任初期(2016-2017 年).....	5
結論.....	10
■ 附記.....	i
■ 作者簡歷.....	ii

摘要

本文透過概觀馬英九兩任八年執政期間及蔡英文上台後將近一年任內台灣當局展開的文化政策，並檢討該時期在台灣所發生的文化摩擦，就目前的台灣內政及兩岸關係所面對的局面進行分析。對當今的台灣政權來說，在重視經濟的前提下推動文化政策，可以規避圍繞中華文化定位和台灣主體性的相關政治爭議，是有一定好處的。但是，馬英九政權的文化政策似乎偏重「經濟」，強調「大陸」，在政權後期，與市民的「台灣認同」之間顯得失衡。與馬時代相比，蔡政府成立後的台灣文化政策則是降低了追求經濟性目標的優先順序。另一方面，蔡政府的文化政策是將追求文化性目標放在最前頭，特別是將「轉型正義」的推動作為重要課題。但由於銅像問題導致社會裂痕表面化，因此不能說其政策施行是一帆風順的。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cultural policy in the first year after Tsai Ing-wen took office in May 2016, through a comparison with the Ma Ying-jeou administration. The Ma administration emphasized the economic purposes of their cultural policy in an attempt to avoid touching upon the sensitive issue of how to evaluate the “Chineseness” or the “Taiwaneseeness” of Taiwanese culture.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 administration also over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relations with mainland China, which led to a breakdown in the balance in the civic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as a result. In contrast to this, the Tsai administration’s cultural policy has put less emphasis on pursuing economic purposes, and more stress on cultural purposes; a key example of this being their “transitional justice” policy. However, as the sequence of social incidents which occurred in Taiwan after Tsai took office demonstrate (such as the beheading of statues of Hatta Yoichi and Chiang Kai-shek), it is clear that the Tsai administration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this regard.

台灣的文化政策與兩岸關係（2008-2017 年）

家永真幸

（東京女子大學現代教養學部國際社會學科副教授）

一、前言

本文透過概觀馬英九兩任八年執政期間及蔡英文上台後將近一年任內台灣當局展開的文化政策，並檢討該時期在台灣所發生的文化摩擦，就目前的台灣內政及兩岸關係所面對的局面進行分析。

如從 2017 年度文化相關預算佔當局總預算的比例來分析台灣的文化政策，則會發現：文化部的預算僅佔約 1.0%，而文化相關整體預算也未超過總預算的 1.5%¹。但文化政策並非僅追求經濟性目標的政策，更加注重的是難以用金錢價值衡量的「文化性目標」的實現。在台灣政治中，該文化目標的設定與居民的認同問題密切相關。因此，可以想見台灣的文化政策也可能會成為展開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觀察點。

如果按照大衛·索羅斯比（David Throsby）所提供的框架來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今日的台灣文化政策具有既追求經濟性目標又追求文化性目標的兩面性。所謂的文化性目標，換句話說，就是「在經濟和社會中增加文化價值的創造與吸收的課題」。儘管難以對此處所說的「文化價值」給出明確的定義，但從不能用金錢作為尺度進行衡量的角度來說，它與經濟性價值構成一對相對的概念²。

本文內容主要分為兩大節。第一節將試圖從文化政策的角度來探討馬英九兩任八年執政期間的特點。其中，會特別著眼於該政府如何就「台灣內部的中華民國民族主義」以及「與大陸的關係」這兩個「中國」因素來拿捏距離。下文中，首先會針對馬英九政權下文化政策的理念和成果進行概述，接著對該政府卸任前夕作為壓軸演出的文化活動——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的開館進行考察。

第二節的焦點則放在 2016 年 5 月蔡英文上任後近一年內所施行的文化政策。先是初步確認了蔡政府在文化政策中所追求的經濟性目標及文化性目標之優先順序，緊接著分析了其設定的目標以及實現的手段。後續以 2017 年 4 月台灣媒體大

¹ 〈中華民國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各歲出機關預算總表〉、〈中華民國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各歲出政事預算總表〉、行政院主計總處，〈<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40924&CtNode=6307&mp=1>〉，2018 年 1 月 24 日確認。以下若未特別註記，引用網頁之瀏覽日期及確認日期均同。

² デイヴィッド・スロスビー，後藤和子、阪本崇監訳，《文化政策の経済学》（ミネルヴァ書房，2014 年），頁 19-24、47-48。

做文章的「銅像問題」為例，對該問題所象徵的台灣社會內部的文化摩擦之焦點以及該事件對兩岸關係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做了進一步分析。

二、 馬英九政權時期（2008-2016 年）

（一） 馬英九政權文化政策的特點

以下將就馬政權文化政策的特點進行歸納及分析。第一，從「產業」這一側面來捕捉文化的傾向非常明顯。我們在回顧馬政權的文化政策時，最明顯的一個線索就是 2008 年總統選舉期間所公布的政見——「馬英九、蕭萬長文化政策」。2008 年 5 月，馬英九總統就任之後，該文件成為各個相關部會的施政基礎³。通讀該文件，印象較深的是從經濟產業的側面來闡釋文化的重要性之態度非常明顯，這在文件一開頭就表明。該文件其中一個關鍵詞就是「文化創意產業」。該詞彙的概念非常模稜兩可，一言以蔽之，是泛指時尚等需要創造性的產業。

關於振興文化創意產業，最初並非由馬政權所提倡、推動的⁴。在民進黨任期內，2002 年 5 月 31 日行政院核定推動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2002-2007）」當中已經首次提出了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在當時已經出現了一種局面，就是經常可以看到博物館及廣場等各種公共設施以「文創」為名開展了五花八門的商業活動。繼承這種潮流，馬政權任期內，即 2009 年年初，「文化創意產業」成功入選為政府優先投資的「國家六大新興產業」之一⁵。2010 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成立，該法明確規定了政府應致力推動該產業的發展⁶。

那麼，結果究竟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呢？根據文化部發行的《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指出，2007 年全年文化創意產業收益總額約為 6,171 億元新台幣（下

³ 〈總統政見〉，國家發展委員會，〈<http://www.ndc.gov.tw/News.aspx?n=ACEC23706E499460&sms=691A08254BBD61D8>〉，2016 年 5 月 15 日瀏覽。

⁴ 朱紀蓉，〈博物館發展中的國家力量——台灣經驗討論〉，《博物館學季刊》28 卷 1 號（2014 年 1 月），頁 5-29。

⁵ 六大產業分別是指生物科技、綠色能源、精緻農業、觀光旅遊、醫療照護、文化創意。〈六大新興產業〉，國家發展委員會，〈<http://www.ndc.gov.tw/News.aspx?n=E641F7FF2AE058A1&sms=8B7FD77816422CEF>〉。

⁶ 根據該法規定，文化創意產業中包含以下 16 種產業。①視覺藝術、②音樂及表演藝術、③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④工藝、⑤電影、⑥廣播電視、⑦出版、⑧廣告、⑨產品設計、⑩視覺傳達設計、⑪設計品牌時尚、⑫建築設計、⑬數位內容、⑭創意生活、⑮流行音樂和文化內容、⑯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的產業。〈文創進行式——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暨相關子法彙編〉，文化部，〈<http://cci.culture.tw/cht/index.php?code=list&ids=26>〉。

同)，而 2014 年增長至約 7,945 億元⁷。但是，上述「挑戰 2008」計劃開始之際——2002 年的數額僅為約 4,353 億元。由此可見，與民進黨執政時期相比，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降。站在文化部的立場上，當然是想強調其成果。但是，作為政績來看的話，這個部分實在很難宣傳。

馬政權文化政策的第二個特點是，自始至終貫徹著將台灣定位為「中華文化的推動者」這一態度。馬英九連任之後，即 2012 年 6 月，行政院通過了「黃金十年的國家展望」。筆者從這裡面摘選出了與文化政策較為相關之內容，下面試舉其中幾例。「文化創意：建設台灣成為中華文化領航者」、「發揮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的優勢，強化台灣多元、民主的價值觀的影響力，提倡正體字，〔與中國大陸〕共創優質的中華文化」，「文化交流：善用各項文化軟實力，推廣具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提升國家形象與國際影響力」等⁸。

站在馬政權的立場上，可以說由於推動緩和與大陸的關係之政策的實施，帶來了旅遊產業的發展，這給台灣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效益。2007 年，全年來台旅客人數約 372 萬人，而 2015 年飆升至約 1,044 萬人。為此做出巨大貢獻的正是從中國大陸而來的遊客。大陸來台的團體旅行從 2008 年 7 月全面開放，直到 2016 年 1 月的接納總數達到約 1,068 萬人，由此帶來的外幣收入高達 5,455 億元。自由行方面，從 2011 年 7 月開始正式起航，平均每天約 3,000 人，全年來台人數大約為 100 萬人。據估計，2016 年 1 月底之前來台的總人數約為 340 萬人，全年外幣收入約 507 億元⁹。此外，作為台北旅遊的一個重點項目，「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全年來館人數在 2007 年度約為 265 萬人，到了 2015 年，則上升至約 529 萬人¹⁰。

作為中華文化的推動者，馬政權是相當有自信的；然而，在表現「台灣」的主體性方面，卻是非常消極的。另一方面，馬政權對台灣的主體性表現出一定的擔憂，由此可見，馬政權在「中華文化」和「台灣的主體性」之間，一直在追求著一種非常微妙的平衡¹¹。這可以說是馬政權文化政策的第三個特點。

例如，第一期馬政權成立不久，就從大陸接收了一對熊貓「團團」和「圓圓」。在辦理手續時，台灣輿論對此也展現擔憂的態度，熊貓到底是「國內遷移」還是

⁷ 賴逸芳等編，《2015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新北市：文化部，2015 年），頁 9-10。

⁸ 〈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附錄—八大遠景施政主軸〉，中華民國行政院，〈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3D06E532B0D8316C&sms=4ACFA38B877F185F&s=4C2D9CB0DB5E8CF6〉，2016 年 5 月 15 日瀏覽。

⁹ 〈政府施政成果（即時更新）〉 2016 年 5 月 4 日版，頁 21、50-52，中華民國行政院，〈<http://www.ey.gov.tw/cp.aspx?n=e6768c3625eab726>〉，2016 年 5 月 15 日瀏覽。

¹⁰ 〈施政計劃、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國立故宮博物院，〈<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3006230>〉。

¹¹ 這在先行研究中也指出，例如，菅野敦志，〈台灣化の行方——馬英九政權の文化政策〉，《ワセダアジアレビュー》11 號（2012 年），頁 36-41，以及山崎直也，〈馬英九政權の教育政策と中台關係〉，《海外事情》57 卷 1 號（2009 年 1 月），頁 60-72。

「國際遷移」呢？當時在大陸當局的合作之下採取了模稜兩可的處理方式¹²。此外，台灣有一種非常稀有的固有品種的熊「台灣黑熊」，其稀有程度可以同熊貓相媲美。馬政權任期內，將此動物確立為台灣象徵的此一舉動也非常明顯¹³。「中華文化」和「台灣的主體性」之間的平衡問題，在圍繞著故宮博物院的政策方面也有顯著的體現。

（二）故宮南院開館

故宮南院的開館與旅遊業的發展有密切相關，使得原本僅圍繞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相關政策、事業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可以說，這象徵著馬政權執政期間所造就的文化局面。換言之，在馬政權下的台北故宮，陸續將民進黨政權任期時沒有實現的大型活動付諸實踐。例如，拓展與中國大陸合辦展覽為主的交流活動、促成亞洲首例的日本展出、在嘉義縣成立南部分院等等。以上所述的各項事業不僅對文化創意產業和旅遊業的振興做出了貢獻，而且從發揚中華文化、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或者說是確保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角度來看，也非常符合馬英九政權的施政理念。

其中，南部分院從 2015 年 12 月 28 日開館試營運，可以說這是馬英九政權落下帷幕前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活動。中國國民黨過去對於在台灣「分割」故宮文物是非常消極的¹⁴。因此，我們可以評價馬英九政權此施政在歷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究竟馬政權為何著手推動建設南院呢？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選戰的因應策略。公布動工建設南院是在 2011 年 10 月，正值馬英九政權企圖連任總統選前。普遍認為，國民黨有必要表明台灣的南北文化差異，以及努力填補經濟差距的態度。再加上，他們也有觀光政策方面的考量。在上述所說的「黃金十年國家展望」中，作為「文化創意」的一環，可以舉出兩個例子，即 2015 年故宮南院竣工和「大故宮計劃」的推動¹⁵。後者是擴大台北故宮博物院的佔地面積以及展示空間的計劃，

¹² 按華盛頓條約規定，熊貓的國際商業交易是被禁止的。但是，中國大陸效仿將中藥輸出台灣的方式，取代華盛頓條約中規定的證明，發行了「野生動植物允許進出口證明」。其出口地記載為「四川汶川縣」和「CHENGDU [成都]」，進口地為「台灣台北」和「TW TAIPEI」。(第 7 屆第 3 會期第 3 次會議記錄 (2009 年 3 月 6 日))，《立法院公報》98 卷 8 期，頁 375。

¹³ 2010 年 12 月 25 日的總統府視頻雜誌《總統治國週記》中，馬英九身穿印有台灣黑熊 V 字花紋的 T 恤出現在畫面上，進行了保護台灣黑熊的宣傳節目。此外，交通部觀光局從 2013 年年底開始，致力於提議、普及以台灣黑熊為原型的「台灣喔熊」宣傳吉祥物。

¹⁴ 例如，〈第 2 屆第 3 會期教育委員會第 9 次會議記錄 (1994 年 3 月 30 日)〉，《立法院公報》83 卷 24 期，頁 416。

¹⁵ 〈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附錄一八大願景施政主軸〉，中華民國行政院，〈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3D06E532B0D8316C&sms=4ACFA38B877F185F&s=4C2D9CB0DB5E8CF6〉，2016 年 5 月 15 日瀏覽。

馬英九在此計劃中下令研究如何發展台灣的旅遊業¹⁶。建設故宮南院方面也是同樣，當初是被期待建設為台灣南部旅遊的壓軸項目。由此可見，這項措施作為產業政策的色彩是極為濃厚的¹⁷。

那麼，故宮南院竣工之後，馬政權最終是否把過去象徵「中華」文化的台北故宮之定位改變了呢？實際上並不能這樣說。在馮明珠院長的領導下，故宮博物院在台北和嘉義的南北兩個「院區」的運營一直都遵循著「一個組織，一套制度，全宗典藏，分處管理，文物不分」的方針¹⁸。馬政權實際上仍按照這項方針去推動南院的成立並給予新的定位。也就是說，中國國民黨仍然是將這些有朝一日必須歸還大陸的故宮文物保持形式上不「分割」的狀態，並且將故宮南院定位為「亞洲的博物館」。

那麼，在台灣民眾當中是如何看待故宮南院的呢？由於開館時間還不長，因此本文很難對此進行評價。但是，南院的開館也受到了一些外界的批判，這部分我們也應當加以注意。首先，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前館長吳密察批評道，南院開館的同時，不斷推動擴大台北故宮的規模，不應該將台北收藏不下的無聊文物送到南部。並且，他還提議道，應該在台北故宮的主要收藏品，即「文獻、書畫、器物」中，把包括翠玉白菜和肉形石在內的所有「器物」都轉移到南院¹⁹。

此外，作為更為情緒化的反應是，在南院開館第3天，即2015年12月30日發生了一個事件，即裝飾在院內的「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仿品上被塗上紅漆，在底座上被寫上「文化統戰」的字樣。該雕像是中國全國政協委員成龍贈送給博物院的禮物。對其進行破壞的是主張台灣主權獨立的團體「台灣國辦公室」的成員們²⁰。

¹⁶ 〈大故宮計劃〉，國立故宮博物院，〈<http://theme.npm.edu.tw/gpmep/zh-tw/default.aspx>〉，2016年5月15日瀏覽。

¹⁷ 〈故宮刻正規畫“南部院區”各項週邊相關配套措施 期望與地方政府建設相連接，共創雙贏〉，國立故宮博物院，〈<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4006216>〉，2016年5月15日瀏覽。

¹⁸ 黃昱珽、林詩庭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年報 104 年年報》（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年），頁12。

¹⁹ 〈故宮南院定位 吳密察建議：專展器物〉，《自由時報》，2015年12月31日，〈<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557034>〉。

²⁰ 〈故宮南院 龍馬獸首遭潑漆〉，《蘋果日報》，2015年12月31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1231/36985119/>〉。

三、 蔡英文上任初期（2016-2017 年）

（一） 蔡政府的文化政策地位

概觀蔡英文上任之初的施政方針可以發現：與馬英九相比，蔡政府給人留下了優先推動文化性目標，而經濟性目標優先度較低的印象。

蔡英文在 2016 年 5 月 20 日發表總統就職演說時，提出了新政府將致力於解決以下五個課題：①經濟結構的轉型、②強化社會安全網、③社會的公平與正義、④區域的和平穩定發展及兩岸關係、⑤外交與全球性議題²¹。關於其中的①，如借用佐藤幸人的分析就是：「蔡政府的基本構想是，通過打造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提高生產效率，從而使年輕人的加薪成為可能」。為了實現前述目標，提出了兩大政策：第一、推進對外發展（包括參與 TPP 等及推動「新南向政策」）；第二、推動被稱為五大創新研發計劃的產業政策²²。五大創新產業包含：①亞洲矽谷、②智慧機械、③綠能科技、④生技醫藥、⑤國防產業²³。

為了將上述產業與馬英九執政期間的重點產業進行比較，在此以 2009 年選定的「國家六大新興產業」為例來說明，該「六大新興產業」分別為：①生物科技、②綠色能源、③精緻農業、④觀光旅遊、⑤醫療照護、⑥文化創意產業²⁴。經對兩者進行比較發現：蔡政府的產業政策比較引人注目的是，未將「精緻農業」、「觀光旅遊」、「文化創意產業」列入國家重點產業。筆者在上節對馬英九執政期間（2008-2016 年）的文化政策進行考察發現，由於該時期比較偏重於追求經濟性目標，因此為了實現該目標並且希望與大陸和睦相處的同時，發揮了實現弘揚中華文化及振興旅遊業的相乘效果。而蔡政府並無延續前述方針的意願，從此可推論其政權勢必將「觀光旅遊」與「文化創意產業」視為陪襯。

在蔡政府成立後，不僅未將「文化創意產業」列入整個國家的重點產業之中，文化政策結構框架中的經濟性目標所處優先等級也較低。在文化部的中期施政計劃（2017-2020 年度，2016 年 8 月 18 日經行政院審議通過）中，列舉了六項內容作為施政重點，按順序排列為：①再造文化治理，構建支持藝術自由的體系；②連接並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③深化城市建設，發揚生活「所在」的本地文化；④通過提升文化內涵振興文化經濟；⑤開創面向未來的文化新篇章；⑥提

²¹ 〈中華民國第 14 任總統蔡英文女士就職演說〉，中華民國總統府，2016 年 5 月 20 日，〈<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7408&rmid=514>〉。

²² 佐藤幸人〈蔡英文政權の經濟および社会的課題〉《東亞》592 號(2016 年 10 月)，頁 98-108。

²³ 〈五大創新產業〉，國家發展委員會，〈http://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9D024A4424DC36B9&upn=6E972F5C30BF198F〉。

²⁴ 〈六大新興產業〉，國家發展委員會，〈<http://www.ndc.gov.tw/News.aspx?n=E641F7FF2AE058A1&sms=8B7FD77816422CEF>〉。

升資源配置的效率²⁵。從以上可以看出：蔡政府所謂的經濟性目標僅被作為④及⑤的一部分項目。因此通過上述施政計劃可以看出：蔡政府將實現文化性目標放在了較為優先的位置。

（二）鄭麗君文化部長的起用

蔡英文總統就任後，便起用了鄭麗君擔任文化部長。鄭部長是台灣苗栗人，出生於台北萬華。1992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之後，赴法國巴黎的第十大學繼續深造，於1997年取得了政治、經濟及社會哲學碩士學位。2004年至2008年，擔任陳水扁第二個任期下的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2012年，鄭部長以民進黨全國不分區候選人當選為第八屆立法委員，2016年再次當選並於5月20日起開始擔任文化部長²⁶。在被台灣媒體及評論人士戲稱為「老藍男」的蔡政府的內閣人事中，鄭是在蔡政府成立之初以內閣中最年輕且尚處育兒期的女性身分加入，不管當事人自己怎麼認為，鄭部長可以說背負著為蔡政府帶來清新形象的使命²⁷。

早在蔡英文為參加總統選舉做準備之時，鄭部長便參與了文化政策白皮書的制定，因此蔡當選後直接提拔鄭擔任了文化部長²⁸。鄭更是在就任之初便打出了以「厚植文化力、帶動文化參與」為核心理念的標語，而在前文中提到的2017-2020年度六項中期施政計劃中，除了⑥以外的前五項皆被列入了施政主軸²⁹。

在施政主軸中給出的具體政策目標中，提到了諸如召開「全國文化會議」並徵集意見，在一年以內確立「文化基本法」，以及在行政院設置「文化會報」以實現跨部會召開調整文化政策的會議等皆包含在前述①之項下。而「文創院設置條例」的及早立法、電影產業振興的強調則涉及前述④項下所包含的內容。

在前述這些目標中，鄭部長實際上早就取得了林全院長對設置「文化會報」的認可³⁰，並於9月7日召開了「文化會報」第1次會議³¹。同時，鄭部長也為文

²⁵ 〈文化部中程施政計劃（106至109年度）〉，文化部，〈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list_285.html〉。

²⁶ 〈文化部鄭麗君部長〉，中華民國行政院，〈http://www.ey.gov.tw/Member_Info.aspx?n=445B991A1B69EF87&s=784B52A3661172DF〉。

²⁷ 〈林全內閣又老又藍？鄭麗君：不分黨派，用人唯才〉，《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672523>〉。

²⁸ 〈鄭麗君結婚生子「意外」成就兩大事〉，《自由時報》，〈<http://ent.ltn.com.tw/news/paper/1064428>〉。

²⁹ 〈厚植文化力 帶動文化參與 鄭麗君部長發表政策展望〉，文化部，2016年5月24日，〈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49813.html〉。

³⁰ 〈法國為什麼是44個文化部？專訪文化部長鄭麗君〉，《天下雜誌》，2016年5月25日，〈<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6532>〉。

³¹ 〈「行政院文化會報」首次召開〉，中華民國行政院，2016年9月7日，〈

化部獲得更多預算也發揮了力量，最終使文化部預算金額比上年度增加約 23 億 2 千萬元，總預算達到了約 188 億 5 千萬元³²。作為參考，可以來看看行政院直屬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預算，雖說該部門的預算因為南部分院於上年竣工，而被刪除了約 3 億 2 千萬元的建設費，但與前年同期相比，總共減少了約 3 億 9 千萬元，總預算僅有約 11 億 3 千萬元。2017 年 4 月，文化部更是從蔡政府制定的大型建設計劃「前瞻基礎建設計劃」中的「數位建設計劃」、「城鄉建設計劃」項下，分別獲得了約 57 億元和 158 億元的特別預算³³。

2016 年 10 月 17 日，鄭部長在參加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的開館日慶典儀式時，提出了「文化是民主化的重點，只有人才是文化發展的主體，政府不得主導文化發展內容」的觀點。而作為文化政策轉型的方針，她更是提出了應於 12 月召開「全國文化會議」，制定文化政策白皮書的構想³⁴。實際上 2016 年度並未召開前述會議，直至 2017 年 3 月到 6 月之間才在台灣各地依序召開了「分區論壇」，隨後「全國文化會議」則是同年 9 月 2、3 日在台北舉辦。會議議題共有「六大議題」，關鍵詞分別是：「文化民主力」、「文化創造力」、「文化生命力」、「文化永續力」、「文化包容力」及「文化超越力」³⁵。

（三）「轉型正義」和銅像毀損問題

單就新聞報導來看，就任初期的鄭部長，似乎在不少場合上強調健全文化治理體制或是振興文化產業之重要性。而在 2016 年 9 月的人事調整後，發現其自 10 月左右開始轉向頻繁提起「轉型正義」的問題。

轉型正義（的促進）是包含「由非自由民主體制轉為自由民主體制之後，針對過去的歷史開展重新評價」含義的概念³⁶。作為推動轉型正義的一個環節，蔡政府迅速展開了不正黨產的處理及對原住民歷史的重新評價³⁷。此外，在「文化部」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07182E7338CD15D3>。

³² 〈中華民國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各歲出機關預算總表〉、〈中華民國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各歲出政事預算總表〉，行政院主計總處，〈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40924&CtNode=6307&mp=1>>。

³³ 〈文化部前瞻 214 億〉，《自由時報》，2017 年 4 月 27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049386>>。

³⁴ 〈紀念台灣文化協會鄭麗君盼設文化日〉，《聯合報》，2016 年 10 月 18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9586/2030323>>，2017 年 6 月 5 日瀏覽。

³⁵ 全國文化會議，〈<http://nccwp.moc.gov.tw/>>。

³⁶ 薛化元著，李為楨、東山京子譯，〈二二八事件をめぐる歴史清算問題〉，《中京法学》51 卷 2・3 號（2017 年），頁 314。

³⁷ 2016 年 8 月 1 日，蔡英文總統以總統身分，就過去政府採取的「不公平」待遇向原住民道歉，明確表示將參考「轉型正義」框架推進對原住民族政策的調整。後於 2017 年 5 月，通過了明定通過原住民族語言的調查或公共交通機構擴大傳播等內容的「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同時，文化部也依據包括客家話和台灣話在內的「保障本國各族語言發展機會的立場」，推進

主導的領域，對以二二八事件為首的權威主義體制下的人權問題的重新評價也成為大支柱。

10月15日，在社團法人台灣北社（綠營組織）舉行的「台灣文化日活動」文化論壇上，鄭部長就文化政策做了特邀演講。在演講中，她強調應盡快建成早有計劃但一直未實現的，即，將二二八紀念館、景美、綠島和全國的「不義遺址」做一個整體的串連來架構「國家人權博物館」³⁸。隨後不久，在2016年11月，鄭藉由訪問德、法兩國之際，實地前往德國的史塔西檔案局，為建立國家人權博物館，考察了檔案公開和運用方式³⁹。

2017年2月，迎來發生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70週年之際，鄭部長更加明確地向社會表示了其對「轉型正義」態度。同月25日，鄭部長從「面對歷史，正視傷痛，尊重人權」的立場出發，表明了其認為應針對作為蔣介石功績象徵的台北「中正紀念堂」進行「轉型」的態度。而在實現對「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進行修改之前，從讓空間回歸中性使用的觀點出發，採取了停止銷售有權威主義統治者的設計商品以及開閉館時停止播放「蔣公紀念歌」的措施⁴⁰。儘管鄭的行為被媒體指為是「去蔣化」，但鄭卻強調說：「推動轉型正義不是要去蔣化，相反的，我們要面對他」⁴¹。

文化部一方面如前所述，在中正紀念堂問題上，決心要將「轉型正義」「可視化」，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台灣社會開始嘗試將反政府立場的政治思想體系「可視化」，因此導致了一系列可以說是負面連鎖事態的發生。2017年4月16日，位於台南市烏山頭水庫的日本工程師八田與一的銅像頭部遭砍。而此事件的實行犯是一名名叫李承龍的中華統一促進黨黨員⁴²。於是，為了報復八田遭斷頭事件，4月22日急進獨立派團體「台灣建國工程隊」砍斷了位於台北市陽明山花鐘公園的蔣

了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的準備工作。松岡格，〈繼承と前進：蔡英文政権による原住民族政策見直しの動き〉，《東亞》596號（2017年2月），100-110頁。〈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三讀〉，《自由時報》，2017年5月27日，〈<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105651>〉。〈「國家語言發展法」獨鍾台語？鄭麗君否認〉，《自由時報》，2017年3月6日，〈<http://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1995326>〉。

³⁸ 〈鄭麗君承諾：用最快速度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自由時報》，2016年10月15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857070>〉。

³⁹ 〈鄭麗君訪德 首站談轉型正義〉，《自由時報》，2016年11月25日，〈<http://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1898366>〉。

⁴⁰ 〈鄭麗君：面對歷史，提出修法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文化部，2017年2月25日，〈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60044.html〉。門間理良，〈新軍事戰略は『防衛固守、重層抑止』〉，《東亞》598號（2017年4月），頁56-65。

⁴¹ 〈推動轉型正義鄭麗君：不是「去蔣化」而是「面對他」〉，《聯合報》，2017年2月25日，〈<https://udn.com/news/story/1/2307372>〉。

⁴² 〈策劃好多年了！八田銅像斷頭 李承龍：我做的〉，《聯合報》，2017年4月18日，〈<https://udn.com/news/story/11034/2409462>〉。

介石頭銅像的頭部⁴³。隨後於 5 月 28 日李承龍又再次引起了損毀台北市逸仙國小石狍犬的事件⁴⁴。應該說上述無論哪個事件都是由激進分子引起的事件，並不能代表台灣社會的整體意願。但是，由於遭到破壞後損毀的銅像恰好成為媒體爭論的話題，也擴大了台灣社會內部的感情裂痕。

有關台灣的八田與一銅像象徵的意義，台灣現代史研究人員何義麟曾在道破日本的「親台派」與台灣人的歷史認識的偏差時，做出了下列敘述：

台灣在戰後的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所有日語出版物及具有濃厚日本色彩的遺址幾乎都在官方命令下遭到廢棄處分。倘若保留與日本相關的物品，誰都無法預測什麼時候會遭到逮捕或監禁的災禍。儘管如此，仍然出現了地方菁英和農民不屈於政治壓力，不分民族、不計較過往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始終對那些為當地做出貢獻的人表達感謝之意，我認為若能將他們的溫情和勇氣作為插曲寫入台灣史是極具意義的⁴⁵。

參考何義麟的上述評論可以發現，圍繞目前台灣發生的銅像損毀事件的反應，表面上以日本統治時代的評價為爭論點，但實際上承認或是否定台灣民族主義才是主要的對立軸。

此外，銅像的「斷頭」問題，也牽涉到兩岸關係問題。馬英九執政末期的 2015 年 12 月，位於嘉義的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開館時，成龍捐贈了「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的複製品。這些銅像原本被展示於博物院的入口前，但到了蔡政府成立後的 2016 年 11 月，故宮博物院卻將銅像拆除⁴⁶。

由於中國大陸堅信，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是在清末 1860 年英法聯軍掠奪時將頭部砍斷而被帶出的，因此在 2000 年代的中國曾將透過拍賣購回這些流失文物的行為讚賞為愛國行為⁴⁷。成龍對台灣捐贈十二生肖獸首複製品的行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近現代史的歷史觀來看的話，是期待在台灣也能共享這段共同記憶。因此，蔡政府成立後拆除故宮南院的十二生肖獸首的行為，可說是代表著蔡政府

⁴³ 〈蔣中正銅像遭砍台灣建國工程隊：向八田與一獻祭〉，《聯合報》，2017 年 4 月 22 日，<<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419452>>。

⁴⁴ 〈率眾毀百年石獸李承龍收押〉，《聯合報》，2017 年 5 月 30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21/2492503>>。

⁴⁵ 何義麟，〈「日台親和」の虚像と実像〉，《インパクション》120 號(2000 年 7 月)，頁 93-98。

⁴⁶ 〈故宮南院 12 獸首仿品拆了 暫放倉庫〉，《自由時報》，2016 年 11 月 15 日，<<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052249>>。

⁴⁷ 但是，依據中國文學學者中野美代子針對影像史料之分析，很明顯地這些銅像實際在 1930 年前後尚存在於北京近郊。因此中野推論出砍斷這些銅像獸首並將其出售的人是中國的民眾，並指出「對當時的民眾來說，為取悅皇帝，將西洋傳教士們建造的物品加以摧毀並出售，是十分正當的行為」。中野美代子，〈愛國心オークション——『円明園』高値騒動〉，《図書》2009 年 7 月，頁 18-24。

無意願共享前述歷史觀而採取的可視化措施⁴⁸。

四、 結論

對如今的台灣政權來說，在重視經濟的前提下推動文化政策，可以規避圍繞中華文化定位和台灣主體性的相關政治爭議，是有一定好處的。但是，從人們對馬英九政權下南院開館的批判來看，其文化政策偏重「經濟」，強調「大陸」，在政權後期，與市民的「台灣認同」之間的平衡顯得失調。

與之前時代相比，蔡政府成立後的台灣文化政策則是降低了追求經濟性目標的優先順序。依據本文的推測，其文化政策是在試圖脫離對中依賴的整體經濟政策方針，展現出不願繼續沿用馬英九執政時期所以旅遊產業、文創產業、中華文化的振興來實現相乘效應的意圖。另一方面，蔡政府的文化政策則是將追求文化性目標放在最前頭，特別是將「轉型正義」的推動作為重要課題。但由於銅像問題導致社會裂痕表面化的事態，因此不能說其政策施行是一帆風順的。可以認為蔡政府的文化政策基礎，是透過實現台灣民族主義以得到社會的包容並穩定社會為目標，絕不希望出現不安和對立。很顯然，蔡政府在文化政策當中有關文化性目標的追求，今後將會出現舵手也很難掌控的局面。

⁴⁸ 拆除故宮南院十二獸首也不一定反映的是民意，有部分人士認為蔡政權下的故宮博物院是出於政治上的判斷而急於拆除的。〈明斬 12 獸首立委：故宮南院民調作怪〉，《聯合報》，2016 年 11 月 13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14/2102752>>，2017 年 6 月 5 日瀏覽。

附記

本文第一節初稿曾發表於 2016 年 8 月 2 日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與東京大學兩岸關係研究小組共同主辦的『第七屆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研討會』（於上海，虹橋迎賓館），第二節初稿則是發表於 2017 年 7 月 31 日由東京大學兩岸關係研究小組、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共同主辦舉辦的『第八屆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學術研討會』（於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非常感謝研討會參與者的批評與指教。

本論文也是筆者做為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學術振興會提供的科学研究費基盤研究 A「対中依存構造化と中台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ポスト馬英九期台湾の国際政治経済学」（研究代表：松田康博，課題號碼：16H02005）研究分擔者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歷

家永真幸 Masaki IENAGA

學 歷 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博士（學術）

現 職 東京女子大學現代教養學部國際社會學科副教授

研究領域 中國近現代史、兩岸關係、國際文化論

電子郵件 ienaga@lab.twcu.ac.jp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 2017年8月1日創刊

出版日：2018年4月1日

出版者：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輯部：

主編：松田康博

副主編：清水 麗

副主編兼執行編輯：黃 偉修

助理編輯：魏 逸瑩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April 1, 2018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April 1, 2018 Vol. 2 No.4

<http://jeast.ioc.u-tokyo.ac.jp/>

Taiwan's Cultural Policy and Cross Strait Relations

(2008-2017)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